

孙玉玲 著

社会转型期

SHEHUI ZHUANXINGQI XIBU XIANGTU XIAOSHUO CHUANGZUO YANJIU

西部乡土小说

创作研究

西部乡土作家的这种乡土地域的叙事也是在为西部「遮蔽」：以富于诗意的描写，呈现西部大地的文化氛围与西部农民的内心感受，揭示被「现代化」「都市化」语境遮蔽的西部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景象。当然，这也是他们对西部异域想象的一种抗争，为物质相对落后的西部和西部人争取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富足，获得与现代文明和商业文明相对发达的中东部相抗衡的资本，从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的支点。

社会转型期

SHEHUI ZHUANXINGQI XIBU XIANGTU XIAOSHUO CHUANGZUO YANJIU

西部乡土小说

创作研究

孙玉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期西部乡土小说创作研究 / 孙玉玲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226-04748-4

I. ①社… II. ①孙… III. ①乡土小说 - 小说创作 -
小说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5845 号

出 版 人 : 吉西平

责任编辑 : 宋学娟

封面设计 : 雷们起

社会转型期西部乡土小说创作研究

孙玉玲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发展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1 字数 208 千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978-7-226-04748-4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乡土小说与民族想象的焦虑	004
第一节 新型共同体的发现与建构 / 004	
第二节 乡土经验与文学指称 / 009	
第三节 当代西部的存在、困惑与焦虑 / 018	
第二章 当代西部“乡土经验”的代际与接力	024
第一节 流寓型作家群的异域表达 / 030	
第二节 本土作家群与本土表达的兴起 / 054	
第三节 新生代作家群的多元写作 / 064	
第三章 “被改变”的西部农民与西部乡村形象	074
第一节 守成型农民与西部乡村的“轴心” / 077	
第二节 叛逆型农民与西部乡村的“变脸” / 090	
第三节 流浪型农民与西部乡村的“在路上”状态 / 103	

第四章 西部乡土小说的主要建构要素	128
第一节 自然：表达与检验西部的“场” / 129	
第二节 民俗：追忆与考量“原乡”的“线” / 146	
第三节 宗教：浸润与提升文学的“色” / 180	
第五章 叙述话语与西部乡土的现代表达	195
第一节 现代性话语与启蒙叙事的复兴 / 198	
第二节 革命话语的演变与民族、民间文化叙事的兴起 / 209	
第三节 底层话语中的苦难书写与诗意叙述 / 218	
结 语	237
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48

绪 论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转型之中，在摆脱外辱内困的过程里，经历过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摸索，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逐渐以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步入了现代世界发展的正常轨道，也从这个时段起，中国社会开始了它的又一个剧变时期。作为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农业文明古国，中国日益改变着其原有的发展轨迹，被裹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中，社会结构在逐渐摆脱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向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经济基础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随之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将中国置身于更加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原本应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中国则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共同挤压着每一个个体，原本由乡土文明所表征的中国民族特色，也面临着逐渐被淹没和一体化的命运，因此，民族性、本土性的彰显显得迫切和必要，“乡土”、“地域”所代表的本土性、民族性意义也就日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商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等为表征的现代浪潮，正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冲击着原本封闭和静态的中国乡村，使它处在一种复杂的文化语境中，也为有百年历史的中国乡土小说再次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话语空间。西部文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赢得了言说的时间机遇与空间机会。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自诞生起就处在现代/传统、西化/民族化、

城市/乡村等这样的二元对立与激烈交锋中，人们也常常通过它描绘的乡村、农民的状态，来考察现代国家的建构、民族品格的重铸、新文学叙事方式的成熟与否等等。就整个中国文学而言，西部乡土文学是中国乡土文学在新时代里的发展延伸，也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一个重要的地域性分支。在新的时代里，当要求文学应担负坚守中国文学理想、中国作家应以自己的文学智慧与世界对话并寻求“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①时，西部乡土作家也逐渐站在了这面大旗之下，日渐成为其中坚力量之一。他们选择了西部这块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传统文化相对深厚的古老地域，来作为文学生发和创作的场域，试图在中国文学追寻世界性与本土性对话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努力寻求和建立文学新的意义与生长点。

广袤的西部在中国地理版图上是一块有着特殊历史与文化的区域。今天，现代工业文明的阳光已经普照在中国沿海地区和中原大地上，后工业文明的萌芽也已经在中国沿海的大都市与发达的中等城市蔓延，主流意识形态与媒体文化结合，对其进行扩散和传播，它们已经波及整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但是，“前现代式的农耕文明社会文化结构仍然存活在中国广袤的中西部不发达地区，虽然刀耕火种式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不复存在，但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仍旧在延续着”^②。作为中国版图上较为特殊的西部地区，虽然它也不可避免地裹入了现代化浪潮中，但相较于现代发达程度较高的中东部地区，它已在主流发展态势中落后了，在很长时间里也就日渐失去了社会发言的话语权。“西部大开发”工程的实施，是国家出于经济、政治等战略考虑，但也让西

① 赵学勇：《全球化时代的西部乡土小说》，《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

② 丁帆：《对转型期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几点看法》，《文学教育》（上）2010年第2期。

部找到了言说自己的机遇。在此情形之下，“西部文学”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之下，西部人用文学的方式来为西部寻求话语言说权力。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西部由于自然、历史、多种文化样态交融并存等原因，获得了精神上的富足与文化上的自信，也为地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部乡土小说有了一定的成长基础与提升空间，不同代际的西部乡土作家们根据自己的乡土经验，依托西部独特的文化样态，选取适合时代与自身特点的叙述话语，对西部乡村和西部农民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建构与思索。他们依托“西部”这片富有特色的地域，一方面来对中国乡土文学中现代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民族品格的思考与重铸等这样的主题继续跟进和探索，并在新文学叙事方式的成熟与否等思考中，积极寻求和建立中国文学新的意义与生长点；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日益本真的体验，揭示被“现代化”、“都市化”等语境遮蔽的西部乡村景象，并以此来对现代文明做出深层的追问与思考。

第一章

乡土小说与民族想象的焦虑

中国乡土小说自创作始，就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保守与激进等相互交织的矛盾与焦灼的语境，在这样的语境背后，是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建构和发展问题的思考，以及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探索与想象。无论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型共同体的构建，还是在世界共同体中对民族共同体个性特质的保持，中国乡土文学都在焦灼中进行着守望与探索，从它名称的演变及内涵、外延的扩充，到对地域乡土的关注等，它无不呈现出一种焦虑状态。

第一节 新型共同体的发现与建构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开始，随着国门打开和外辱内困的逼迫，开始了寻求民族发展的新生之路，这个寻求从两个基本维度来进行：一个是逐渐从家族、王朝国家等传统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独立个体逐渐生成，另一个则是以独立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型共同体的生成与构建，两个维度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这两个维度的展开，也意味着古老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且“由此可以推衍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两个轴心或者

说两个方向：总体性、‘历史化’的方向与个体化、私人性的非历史化方向”^①。因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诉求，就是对新生的现代民众和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新型共同体的建构。这个诉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主题。其中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有：科技意义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政治（制度）维度上的维新变法和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中国内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早期文化探索。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新型共同体建构工程逐渐被革命和战争的炮火所掩盖，直到新中国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的现代性工程建构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当然，这个过程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度出现了偏差和中断，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型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追求的全面展开而重新走上正轨。

作为有着悠久农业历史文明的中国，新型共同体构建的诉求是将一个农业性质的古老中国变成工业性质的现代化中国，这个目标的实现也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乡村和农民的现代性转化。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开始了对这种转化的探索与思考。在文学领域，乡土文学一直伴随着这个构建工程，对各个时期的中国乡村和农民都进行了关注与思索。

20世纪80年代开始，是中国建构新型共同体重要的转折和深入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使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结构发生了变革。这个时期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

^① 李斌：《现代性视野中的流浪意识——以“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文学为中心》，《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化，一般称之为社会转型期”。而“中国的社会转型究其实质而言，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前现代化向现代化、由一元向多元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全面、深刻的变化过程……社会结构转型，不仅经济结构转型，而且非经济结构也随之转型，因此，社会结构转型是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社会发展，即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这种社会转型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包括“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①。由此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是在逐步深化，它从90年代之前的单纯的经济层面的改革，逐渐深入到社会的体制层面、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思想层面等，而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将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性的工业国家。在此情形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开始了大规模的变迁：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从同质的社会结构向异质的社会结构变迁，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处在一个质变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刚刚开始，尚未定型”^②。这样的全面转型表明了新型共同体的构建步伐在步入现代发展轨道之后，踏着世界现代化的步伐加速前进。而这样的加速前进也必定再次会对这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度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还处在前现代文明状态的农村和农民，从生产、生活到思想、灵魂，都产生了巨大的震颤。

自80年代以来的转型，是改革和现代化追求的深入时期，也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时期，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化国

① 同春芬：《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 潘逸阳：《农民主体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家，中国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自身出现弊端和危机，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并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进发的。此时“中国社会终于确立了现代化目标时，它所面对的现代性已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价值象征，而是一个开始残缺的价值实体”^①。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对世界的飞速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随着信息业等新型工业的崛起，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加快，世界变成了所谓的“地球村”，各个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全球化、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中。如此一来，中国置身于更加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挤压着中华民族，结果，“不但普通民众面对文化的冲突无所适从，即使知识精英也由于对不同文化精神的利弊的不同理解而相互分裂”。而在此情形之下，“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性人文精神，相反，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文化正通过某些知识精英而与工业文明精神形成错综复杂的冲突”^②。作为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依旧以中国特有的宗法、血缘、情感、人情等文化因素为基础，附着于大多数中国民众身上。同时，在国家和精英意识的倡导之下，对现代新型共同体的构建追求也依然如火如荼。不仅如此，后现代的文化心态，也通过各种媒介超前地进入中国民众的生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各种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冲突、碰撞、游荡。“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工业文明精神和后工业文化精神通过新的生存方式而渗入或涌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中时，中国民众的文化价值世界开始发生冲突与裂变，

①② 衣俊卿：《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哲学动态》1995年第2期。

出现了新旧交织、传统与现代混杂的格局”^①，中国进入一个裂变时期。

如艾里克·甘斯的判断：当今世界的所有社会实际上都在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构建^②，世界的发展随着全球化、一体化浪潮日益呈现出趋同性。中国一度也以此模式来建构自己的现代共同体。而与此同时，西方的知识界经了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洗礼后，“开始觉悟到‘同’的虚假和霸权一面……追求具体和实在的‘异’成为一时风尚：特殊性和地方性获得空前的学术关注”^③。以中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后发区域，在这场冲击中虽有所受益，但在此情形下，不仅世界的多样性会被打破，这些民族国家也面临着自己民族文化、民族品格等被同化的危机，因此，地方性知识日渐受到重视。对中国而言，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是形成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根基，虽然向工业社会转型为基本目标的新型共同体的构建要求这个根基要发生转变，但其所孕育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却是不可断裂的。因此共同体的构建不仅要吸纳外域文化，同时，本土文化的保持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土和乡土文化所代表的本土性、民族性的价值及作用日益显得重要且必要。在文学领域，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乡土文学也就成为现代共同体构建思索与探讨不可忽略的部分。尤其在今天这种新的形势之下，乡土文学也在新的焦虑中继续对新型的民族共同体展开了新的思考与探索。

① 衣俊卿：《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哲学动态》1995年第2期。

② 甘斯：《文化的终结》，转引自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③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第二节 乡土经验与文学指称

从晚清开始，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一直制约着中国作家们对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与文化的关注，在各种“乡土”经验的制约下，“乡土文学”这一指称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与之相近的称呼也比较多，比如农村题材小说、乡村文学等。这些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在不同历史情境之下，作家和评论家对乡土世界不同的理解、判断、想象与建构。

“乡土文学”概念的诞生是在“五四”时期，周氏兄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其有着很大的贡献。周作人于1923年3月写的《地方与文艺》中便提到了“乡土艺术”的概念，他看重风土的影响，也即培养个性的“土之力”，认为文学要“忠于地”，因为“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并且认为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 and 文艺”^①。1923年4月，他又在为刘大白《旧梦》做的一篇小序中提到了对乡土艺术的爱重，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在与世界文学比较关照的视野中，“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②。从周作人的理论中可以看出，在乡土文学诞生之初就对地方风土的看重，认为地方风土不仅对中国文艺自身有着积极意义，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

①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4—5页。

② 周作人：《旧梦》，《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3页。

格局中显示自身特色与价值的重要元素。鲁迅于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也对乡土文学做了阐释：“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 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徐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动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①鲁迅在这里指出了乡土文学所应具备的几点质素：一是作者，他们多是为故乡和生活驱逐到异地的人；二是题材，作家所写的是自己故乡的事物和生活，而且往往是已不存在或是离自己远去的故乡的事物和生活；三是乡土小说的审美情感取向和表达，是隐现着的乡愁。他对异域情调、地方色彩不做强调，倒是道出了乡土文学所包含的一种家园意识。在这样的论述中，隐含着鲁迅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以及对在这场运动中日渐失落的传统文化既反对又留恋的矛盾态度。

除周氏兄弟外，茅盾对乡土文学的论述在乡土文学的发展史上也很重要，而且也更能看出文学外围因素对文学自身的巨大影响。茅盾在新文学发生发展之初，一直对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保持了强烈的理论兴趣，《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他表达了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11—12页。

对“地方色彩”的看重，不过他没有使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而代之以“农民小说”、“农村小说”。而到1936年，在《关于乡土文学》这篇文章里又沿用了“乡土文学”这一指称：“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满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①。在这里，茅盾指出了“乡土文学”最主要的质素并不仅仅在于对乡土风情、异域情调的单纯描绘，还要关注大众的生活，对作家更要强调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从中可看出，作为左翼作家的茅盾，欲将文学外围的政治立场、阶级观念等引入乡土文学，作为其创作的指导与构建原则，当然，也为“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小说”的命名转换打下了基础。

“农村题材小说”的诞生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作家的乡土创作紧密相关。随着越来越多描写人民疾苦的作品问世，周氏兄弟乡土理论中的地方色彩、个性与文化反思以及精神关注等已渐渐被政治立场所挤压，尤其随着中国社会情势的变化，这些因素在不断缩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更将政治放到对文学创作的绝对指导地位。随着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工程的启动，从解放区开始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造和农业化合作运动，都标志着这项工程的深入展开。为突出社会主义的特色，对阶级立场的强调就是不可避免的，乡土文学的审美特性渐

^①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0页。

渐被政治所消融，其名称发生变化也就成为必然。就如有论者所言：“乡土文学转向‘农村题材’之后，中国主流文学在思想倾向和审美取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倾向上，是民粹主义的民众崇拜；在审美取向上，是暴力美学崇拜。”^①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文学生态日渐正常化，“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再次发生了变化。孙犁1981年《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在评论刘绍棠的作品时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乡土文学’”，因为“不管多么偏远的地区，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断变化”；文艺的根基“就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就是民族性格，就是民族传统。”^②作为从解放区和十七年文学中走过来的作家，孙犁操持的还是民粹主义的立场。评论家雷达、作家刘绍棠、蹇先艾等人也对“乡土文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雷达就认为：“地方色彩很要紧，但更要紧的还是时代色彩。”“‘风土人情’四个字中，‘人情’二字应是乡土文学的灵魂。”^③刘绍棠更看重“农村现实生活风土人情”^④。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乡土文学的关注点不仅恢复了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相关论述中所看重的地方色彩等审美品格，而且又加进了“时代色彩”等新的内涵，从中也体现出这些评论家们希望乡土文学对“当下”进行关注。当“寻根小说”崛起之后，乡土文学以及它的主体样式——乡土小说的内涵、外延又有着新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构建工程的加快，中国农业社会快速变迁，在新的社会背景和外来文化的比照之下，对“乡土文学”的关注中又有了新变，一部分学者仍继续沿用“乡土文

① 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 孙犁：《关于“乡土文学”》，《北京文学》1981年第5期。

③④ 雷达、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鸭绿江》1982年第1期。